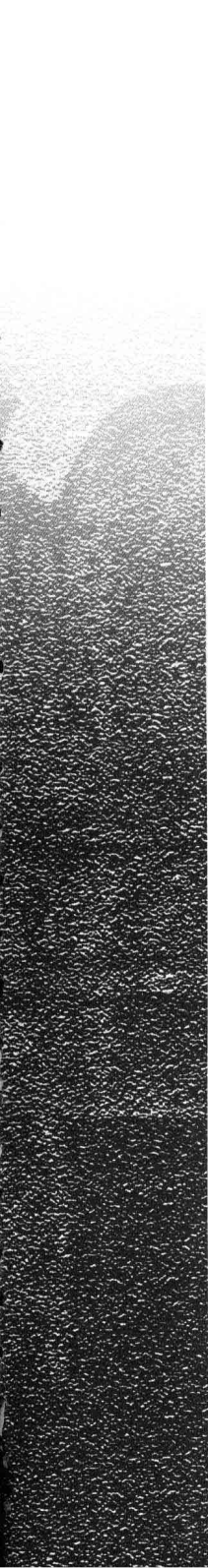




1927—1937  
中共中央机关  
在江西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1927—1937

# 中共中央机关 在江西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主 编 沈谦芳

副主编 王瀚秋 万建强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沈谦芳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 - 7 - 210 - 03952 - 5

I. 1. 1… II. ①中…②沈… III. 中共中央 - 组织机构 - 史料 - 江西省 - 1927—1937 IV. 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3562 号

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沈谦芳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共南昌市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90千 印数:1-1000册

ISBN 978 - 7 - 210 - 03952 - 5 定价:28.00元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绪 论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曾经是一块风云际会的革命热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既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预演了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同时又经受了反“围剿”战争胜利与失败和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的考验。《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从一个侧面铺开了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画卷，集中展现了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在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随即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政策。1927年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负责组织、指挥南昌起义的一切事宜。8月1日，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功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由此，南昌成为人民军队的摇篮。

同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在起义先胜后败的情况下，审时度势，率起义军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创建了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创建了

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开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江西遂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

1931年1月15日,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移驻瑞金。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斟酌,确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等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到任书记之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瑞金因此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被中央赋予管理和指导全国苏区的职责。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取得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发展壮大红军、建立了全国性的红色政权,为发展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以及项英、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到来,既表明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高度重视,又为中共中央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和逐渐转而接受来自中国革命实际的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正确主张准备了相应的条件。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的情况下,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即,成立了中共中央局(随后,苏区中央局并入其中),博古、洛甫、陈云为常委,博古负总责。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正式的中共中央,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为常委,博古仍负总责。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都设在瑞金,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即党中央的本体而不是派出机关。从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长征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主张,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党的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领导了苏区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苏维埃区域执政的伟大实践,积累了治党、治政、治军、治国的初

步实践经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虽然是被迫而不是自觉地,但毕竟完成了由大城市向农村的最后转移。这一转移与中国革命所要走的和当时正在走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之要求是一致的,直接促进了中共中央在与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实际更为紧密的结合中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突围转移。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等为委员,负责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分局自1934年10月成立至1937年12月撤销,历经3年,在十分艰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党保存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和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毋庸讳言,我们在充分肯定在江西设立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分局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绝不能否认或掩盖这些中央机关在所在的历史时段,曾有过的失误或曾犯过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的错误。比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设立,虽然旨在加强对全国苏区和红军的统一领导,但实质是以贯彻执行当时在党中央业已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前提的;虽然在实践中,这种错误因受到抵制而未能在中央苏区占据统治地位,但对于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当时的对敌斗争也确实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更为严重的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到江西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统治不仅在党中央发展到顶峰状态,而且在中央苏区也得到更全面、更直接地贯彻执行,最终导致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对这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绝不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要实事求是地阐述清楚,并剖析其产生的

根源和留下的教训,从而警示后人。

当然,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后期惨重的失败也是探索,因为它宣告的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彻底破产,锤炼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革命意志,推动的是中共中央的加快脱胎换骨、走向成熟。比如,毛泽东本人在中央苏区时期,虽然屡屡遭受排斥和打击,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武器,却在同各种错误特别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作最坚决的斗争中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越来越为全党同志所接受。又比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陈云都是在经历了中央苏区时期血与火的对敌斗争以及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考验后,经过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逐渐凝聚起来,从而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另几个重要领导成员如张闻天、王稼祥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走向失败的煎熬中,逐渐怀疑和抛弃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并在长征路上给予毛泽东以坚定的支持。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的逐步形成,正是在错误和失败的反复实践中党内积极健康因素不断增长壮大的结果。还比如,经历中央苏区时期的斗争后,党在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我们党由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共产国际在世界东方的一个支部,大政方针都要听命于共产国际,中央领导人都要由共产国际指定或认可,没有独立自主可言。实际上,我们党年幼时期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的同时,所犯的右倾或“左”倾错误也都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而几乎断送中国革命前途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更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共产国际背景。因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宣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彻底破产的同时,也宣告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错误干预的彻底破产。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我们党在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上毅然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清算中央苏区时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并没有也不能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对此,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sup>①</sup>他主张“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他批评了我们党历史上“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的缺点,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sup>②</sup>。20世纪40年代前期,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延安整风成功地解决了对中央苏区时期重要事件与人物的评价问题,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而,在时光过去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浓厚氛围中,我们更应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央苏区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特别是对博古等“左”倾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者,既要看到他们所犯错误给革命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又要看到他们对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不能全盘否定他们;更何况他们在当时无疑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在后来又都实现了思想观点的转变,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其中有的人还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集体,由幼年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确曾经历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甚至是痛苦的渐进过程。1927—1937年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的不平凡的经历,正是这个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如果说全党公认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

①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



上的伟大转折,是我们党和中共中央开始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标志,那么通过《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党和中共中央主要是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了大量的最直接的数量积累后,才有遵义会议质的飞跃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中央苏区时期足够的最直接的数量积累,我们党和中共中央可能就难以在遵义会议上实现质的飞跃。由此观之,江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而且是锻造我们党和中共中央并使之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革命熔炉。

# 目录

---

|                                    |    |
|------------------------------------|----|
| 绪 论                                | 1  |
| <b>第一章 中共前敌委员会(1927.7—1927.10)</b> | 1  |
| <b>第一节 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成立</b>              | 2  |
| 一、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政策                | 2  |
| 二、酝酿在南昌举行起义                        | 3  |
| 三、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                        | 5  |
| <b>第二节 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活动</b>              | 8  |
| 一、成功举行南昌起义                         | 8  |
| 二、尝试建立革命政权                         | 12 |
| 三、挥师南下遭受重创                         | 14 |
| <b>第三节 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历史功绩</b>            | 19 |
| 一、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的阶段性转折              | 19 |
| 二、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 20 |
| 三、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 21 |
| 四、促成了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 21 |
| <b>第二章 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1—1933.1)</b>  | 22 |
| <b>第一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b>              | 23 |
| 一、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原因及条件                  | 23 |

|                                       |            |
|---------------------------------------|------------|
| 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及职能                       | 32         |
| 三、中共苏区中央局实际负责人的变更                     | 39         |
| <b>第二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历史功绩</b>               | <b>46</b>  |
| 一、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 46         |
| 二、组织召开“一苏大”和具体筹备“建国”                  | 59         |
| 三、指导宁都起义和组建红五军团                       | 77         |
| <b>第三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三任领导人对肃AB团错误的抵制和纠正</b>  | <b>85</b>  |
| 一、富田事变的发生及其定性                         | 85         |
| 二、项英抵制肃AB团错误                          | 90         |
| 三、毛泽东与肃AB团错误的责任及其纠正这一错误的努力            | 100        |
| 四、周恩来为遏制肃AB团错误作出的贡献                   | 110        |
| <b>第四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b>    | <b>124</b> |
| 一、青塘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的传达           | 124        |
| 二、赣南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的推行           | 127        |
| 三、宁都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的升级           | 131        |
| <b>第三章 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1933.1—1934.10)</b> | <b>142</b> |
| <b>第一节 中共中央局的成立</b>                   | <b>143</b> |
| 一、临时中央迁入瑞金的原因                         | 143        |
| 二、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中央领导进入瑞金                  | 145        |
| 三、中共中央局的成立                            | 148        |
| <b>第二节 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b>              | <b>152</b> |
| 一、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                           | 153        |
| 二、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 154        |
| <b>第三节 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的历史功绩</b>            | <b>155</b> |
| 一、明确提出抗日救国主张                          | 155        |
| 二、努力扩大红军和根据地                          | 157        |
| 三、注重党的建设                              | 165        |

|                                    |     |
|------------------------------------|-----|
| 四、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                        | 169 |
| 五、重视苏区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 171 |
| <b>第四节 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的错误决策及其危害</b>     | 177 |
| 一、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 177 |
| 二、进行查田运动                           | 181 |
| 三、实行“左”倾关门主义                       | 184 |
| 四、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 187 |
| <b>第五节 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突围转移</b>        | 190 |
| 一、突围转移的决策                          | 191 |
| 二、突围转移的准备                          | 192 |
| 三、突围转移的实施                          | 195 |
| <b>第六节 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b>        | 197 |
| 一、博古的任职符合组织程序                      | 198 |
| 二、为革命作出了一些贡献                       | 199 |
| 三、任中央总负责人期间成为王明“左”倾错误<br>在国内的总代表   | 203 |
| <b>第四章 中共中央分局(1934.10—1937.12)</b> | 208 |
| <b>第一节 中共中央分局的沿革</b>               | 209 |
| 一、中共中央分局的成立                        | 209 |
| 二、中共中央分局领导的区域与组织                   | 215 |
| 三、中共中央分局的撤销                        | 218 |
| <b>第二节 中共中央分局的主要工作</b>             | 219 |
| 一、临危受命                             | 219 |
| 二、领导苏区军民掩护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突围长征          | 221 |
| 三、领导留守红军和苏区人民开展群众游击战争              | 223 |
| 四、协助中革军委指导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团的行动             | 231 |
| 五、应对严峻局势逐步实行战略转变                   | 234 |

|                           |            |
|---------------------------|------------|
| 六、指挥中央苏区留守红军九路突围          | 242        |
| 七、领导赣粤边、闽西南等地红军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  | 245        |
| 八、领导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组建新四军        | 253        |
| <b>第三节 中共中央分局的历史功绩与失误</b> | <b>257</b> |
| 一、中共中央分局的历史功绩             | 258        |
| 二、中共中央分局工作失误的原因与教训        | 267        |
| <b>大事记</b>                | <b>274</b> |
| <b>后 记</b>                | <b>345</b> |



南昌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 第一章 中共前敌委员会 (1927.7—1927.10)

1927年春夏之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在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革命大旗,进行武装反抗。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和组织南昌起义,并挥师南下、征战赣粤,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中国革命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

第一章 南昌起义前后的革命斗争

之际临危受命,至八七会议改选中共中央政治局时止,工作时间不到一个月,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痛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压迫工农运动,庇护反动军官,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致使“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sup>①</sup>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宣言还表示,中国共产党要和国民党员中真正的革命分子共同进行革命工作,决不退出国民党甚至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这个宣言虽有其不足之处,但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从动摇走向反动,作了一定程度的公开揭露,宣布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不与镇压工农的反动政权同流合污,实际上宣告了“党的新政策之开始”<sup>②</sup>。

7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纠正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出困境、主动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决策在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得到确定。

## 二、酝酿在南昌举行起义

开始,中共中央并没有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而是想利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唐生智的矛盾,联合张发奎,把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贺龙的部队从南(南昌)浔(九江)地区带回广东,以图再举。为了实现这一意图,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和邓中夏前往九江活动。7月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两人同时到达九江,谭平山、聂荣臻也随后到达。

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率

<sup>①②</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180页。



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第二方面军统辖着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和其他一些部队。其中,共产党员叶挺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部队中有大批共产党员。此外,共产党员朱德还担任着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因此,云集在南昌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力量达两万人以上。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唐生智、朱培德调动第三、六、九军对南昌地区取包围态势,张发奎也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sup>①</sup>的表示。局势已到千钧一发的关头。再不当机立断或稍有迟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被完全断送。

7月20日,根据当时局势的变化,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人在九江召开第一次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会议认为,张发奎的联共态度已发生变化,正在日益右倾,而且在南昌、九江间的叶挺、贺龙的部队已处于反动军队的包围之下,依靠张发奎回粤很少有成功之可能,甚至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所以,应该改变原来依靠张发奎的策略,转而实行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独立的军事行动。根据这一决策,这次会议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的暴动,解决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以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sup>②</sup>

会后,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和瞿秋白、张太雷商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事宜,得到赞同,并由瞿秋白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接到报告后,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都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张太雷提出,党中央决定“八一暴动”,是根据“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

---

<sup>①②</sup>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